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Whither Socialism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

[美]约瑟夫·E.斯普格利茨◆著
周立群 韩 亮 余文进◆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Whither Socialism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

[美]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 著
周立群 韩亮 余文波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 / (美)斯蒂格利茨著;

周立群,韩亮,于文波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205-5

I. ①社…

II. ①斯… ②周… ③韩… ④于…

III. ①社会主义经济—经济体制改革—研究

IV. ①F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799 号

社会主义向何处去

著 者:(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

译 者:周立群 韩 亮 余文波

责任编辑:潘丽丽 李相梅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1.25 字数:293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205-5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译 序

(一)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博士是斯坦福大学琼·肯尼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世界银行高级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团主席，并兼任过美国财政部、联邦储备局、美洲发展银行等机构的顾问，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

斯蒂格利茨是美国较年轻的一流经济学家，曾获美国经济学会为有杰出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设立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他在经济学领域是一个有创意并富有挑战性的学者。在其《经济学》一书中，他提出了要“超越马歇尔和萨缪尔森”，推翻新古典综合派体系。他在宏观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公共财政、发展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加之有着在大学、政府部门和国际组织工作的阅历，他洞察深邃、视野宽阔，著述涉猎的问题亦很广泛。主要著述有：《竞争、激励与风险理论》（与 F·马修森合作，1987），《政府经济学》（1988），《国家的经济职能》（1989），《不完全与非对称信息的福利经济学》（1993），《信息与经济分析》（1993），《农户与城市居民：税收、价格与经济发展的负担》（与 R·萨合作，1993）等。

斯蒂格利茨自 1981 年以来多次来我国考察、访问，1998 年 7 月在北京的演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他的一些颇有影响的著述已经被译成中文并为我国读者所熟悉，如《政府经济学》（春秋出版社 1988 年版）、

《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国物资出版社 1988 年版）。

（二）

本书是作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集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转型”国家的改革实践进行系统反思和探视的理论著作。他认为，在长期争论的两种体制选择问题上，在如何有效地向市场经济“转型”问题上，标准经济模型似乎是无能为力的，而本书所要得出的结论则要超越标准经济模型的狭隘界限。

剑桥大学弗兰克拉姆齐学院的经济学教授帕萨·达斯古塔在评论本书时指出：“斯蒂格利茨的理论创新在于他提出了现代经济学最优理论的最佳非对称量。本书在讨论我们身边公共层面的组织这个古典问题时，作者运用这个理论创新对它进行了阐述说明。从深度和广度看，我们可以从这部优秀著作中汲取的营养并不亚于当代最杰出的社会思想家的著作所提供给我们的养分。”

斯蒂格利茨运用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了传统经济理论的缺陷，指出，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因为在标准信息假设中，轻微的不均衡变化将彻底改变标准模型的所有重要结论。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个体搜集、吸收和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而且信息的传递是有噪音的和不完全的，同时人有时会犯错误也是合理现象，这一切都是经济运行分析的前提。描述经济运行仅仅局限于运用价格机制是远远不够的，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价格机制实现帕累托效率的有效性与普遍性是值得怀疑的。因此，新古典模型并不能为市场体制的选择提供理论指导，一旦将信息不完全性引入分析之中，就很难得出市场是有效率的推论。

作者将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引入，进而批评了以新古典模型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定理在描述市场社会主义特征方面的种种错误



理解和误导。指出，其关于竞争市场经济的推论存在两个重要缺陷，即它没有理解市场经济框架的不充分性并错误地鼓吹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它所提供的仅仅是一种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如果新古典模型对资源配置和市场机制的描述是正确的话，那么市场社会主义则应该已经大功告成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批判恰恰也就是对新古典模型本身的批判。此外，资源配置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谁来作决策？决策之前决策者如何获得信息？等等，像这样一些重要问题，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给出科学的回答。

在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新的模型并描述了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斯蒂格利茨的模型不仅为洞察市场经济运行拓宽了理论视角，而且为在转型经济中的体制设计和政策选择提供了有启发性的思路。

(三)

作者结合东欧、俄罗斯及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中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了广泛的探视，如集权与分权、产权界定、私有化、公司治理结构、银行与法人控股、创新、寻租行为、分配关系、逆向选择、道德风险、信息不对称性、资本市场、金融政策、垄断与竞争、政府职能、市场失效与政府失效等等。这里不仅有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和对近些年来某些“时髦”理论观点的评析，而且有对转型国家的目标模式、转型取向、改革时序所作的比较反思，所提出的改革思路与政策建议不乏真知灼见，很有参考价值。

比如，在论述产权制度改革时，作者对科斯定理提出了质疑：产权理论忽视了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交易费用会妨碍交易双方产生有效结果的可能性，即交易结果经常是非效率性的。并认为，缺乏清晰的产权关系未必一定是非效率的。社会主义尝试的失败原因不仅仅是缺乏产权明晰，激励与竞争的匮乏同样是极其重要的。这一点不仅表现在经济上，

而且表现在政治上，然而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就在于信息。

比如，对私有化问题的分析，作者从公共生产与私人生产的比较入手，依次探讨了科斯定理、产权的作用、信息费用、私有化的经济优势与政治依据、私有化的设计与速度、拍卖过程、产业的重新资本化、金融的重新资本化、分散治理与公司治理、银行的监督作用、政府的调控职能，以及中国的成功经验，等等。其中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利弊得失的评析及作者在这一问题上的忠告是很有启发性的。

又如，在分析市场失效与政府作用时，作者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新的市场失效”，认为，新的市场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信息的有偿性以及不完备市场为基础的，而旧的（原始的）市场失效是与诸如公共品、污染的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的。新的市场失效与原始的市场失效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完备市场问题的普遍性，并从这一视角讨论了政府的功能作用。作者认为，新古典理论及构成市场社会主义基础的相应模型没有考虑在不完全信息和存在信息成本时所出现的各种问题，也没有考虑在缺乏风险市场和资本市场或这两个市场都不完备条件下所出现的情况，从而难以对政府职能作出全面的界定。向市场经济过渡决不是要弱化而是需要重新定义政府的作用。政府应做的决不仅仅是对总量进行再分配，而把其他的工作交由市场来完成。当信息不完全时，传统模型所预期的总量分配是行不通的，政府对财富分配的不完全性进行干预的成本也是高昂的。

再如，在论及改革取向和改革路径选择时，作者提出了一系列忠告，如重要的是竞争而不是所有权，应重视转型的货币条件和竞争条件；对某些国家推行的担保制私有化计划，要采取谨慎态度，要注意国家和私人共同持股的大企业中的控制和财团管理问题；要避免转型过程中的“信息超越”和信息损失，防止“激进式”改革对组织的破坏，注意个人和组织的“学习问题”，个人必须学会如何对市场信号作出反应，组织必须学会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在强调市场重要性的同时，也不要忘记消化舶来的经济体制是非常困难的，等等。



作为一部研究转型经济的重要理论著述，它不仅反映了作者本人的学术观点，而且也反映了近些年来经济学新发展在经济转型问题上的应用。

如果说斯蒂格利茨的其他几部中文译著主要分析和阐述的是美国或西方的事件，那么本书则更多地讲述和评析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转型”国家当今发生的事件，这对于我国的读者来说或许有更直接的参考价值 and 更多的发言权。就此而言，它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中国“转型”中的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和思考。不过我要强调，任何一种经济理论都不可能提供现成的运用于政策的结论，它只是作为一种方法或思维工具帮助和启迪掌握理论的人去作出科学的推论。

(四)

1997年我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作学术访问期间阅读了该书（此时已是第三次印刷了）。我注意到“转型”问题已是近些年来经济学（不仅仅是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西方国家不仅有专门的“转型”研讨会和大量的研究论著，而且有专门的《转型》杂志（Transition）。西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重视和关注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不是个别国家或地区的事件，也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国际性的又是全方位的，这大概是90年代最为重要的事件了。制度变迁和体制演变使得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制度理论和组织理论的研究兴趣出现了复苏，一些新的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在经济学领域产生的共振。（参见 Oliver E. Williamson, *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96.; 及周立群：《组织理论与组织经济学》载《经济学动态》1998年第5期）与国内的研究相比，西方学者在“转型”研究的出发点、视角和方法上是不尽相同的，他们不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如信息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对经典经济理论（如本书批判的新古典经济模型）进行深刻的反思，



对制度变迁和资源配置形式的转换作出了新的阐释；而且将这一“转型”置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大格局中来审视，将其作为世界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迁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看来，一批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恰好与全球经济的一体化、信息革命、金融的国际化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同步。这一“转型”隐含着 21 世纪经济发展、世界市场格局以及社会制度和新型组织形态的许多重要内容。世界在发生变化，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许多新范畴、新理论的出现正是这种变化的产物。

当我们将中国的改革与发展纳入世界经济格局中定位审视时，不应忽略了中国改革发展道路已经显示出的成功性和独特性。在笔者看来，与东欧、前苏联国家相比，中国的改革“转型”和经济发展在制度基础、目标取向、路径选择、时序安排上是有其特色的。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不仅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过的道路不同，与传统大国的发展历程和发展模式也不同，——国外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正日益显示出了它将会成为一个全方位的强国。同时，“转型”决不仅仅是一种调节机制替代另一种调节机制，它本身也是个信息和知识的积累过程，并与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型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就此而言，时代为中国的经济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们的理论思维也应切入到更深厚、更广阔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之中。

同时也应看到，在“转型”中的制度设计、目标取向、政策选择等问题上，西方学者的认识与评价亦存有很大差异，比如，在转型的速度与方式问题上，主张“休克疗法”的人说，你不可能分两步跳过一条沟壑；主张“渐进式”转型的人说，只有通过十月怀胎才能一朝分娩。显然对“转型”过程中的难题还处于摸索和探讨中。作为一个西方学者，斯蒂格利茨观察问题的价值观和表达方式与我们不尽相同，对此明智而有鉴别力的读者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书中涉猎的问题又很广泛，译文一定有不妥之



处，望读者不吝指正。

周立群

1998年8月于南开大学

前 言

1990年4月，我在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维克塞尔经济论坛上首次论及此书。我原打算在会上将我过去20年研究的重点——信息经济学的现状作一个综述。但是，社会主义剧变，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政策问题，并使得旧的理论重现生机：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如何才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的经验对长期争论的两种体制的选择问题将作何解释呢？

与以上两个问题相关的第三个问题是：传统经济模型对这些基本经济问题作何解释呢？标准经济模型对这些问题似乎无能为力，而我所得出的结论则超越了标准经济模型的狭隘界限。目前，许多东欧国家正处于灾难困苦之中，在我看来，标准经济模型对此应负部分责任。凯恩斯在其经常被引用的一个段落中写道：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不论其对与错，都比通常的理论更具有影响力。事实上，我们的现实生活正是被这些人所左右。那些实用主义者，坚信自己不受任何理性的影响，但往往正是这些人受着某些已故经济学家思想的奴役。那些扑风捉影的权力狂人们正从几年前的拙劣学者的著作中发泄他们的狂傲。我认为，那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力相对于学者们逐渐深入人心的思想的影响力来讲也被过分夸大了。

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表明，某种经济学思想导致了世界近半数人口

遭受痛苦。

新古典经济学通常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立起来。但前者并未提供一种可行的模式，至少在流行于英美的新古典理论中是这样的。它提供的仅仅是一种看似与潜在效力相距甚远的经济模型，恰恰是这种潜在效力支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假设、描述和所涉及的问题。虽然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比以往的都优越，但这一点并不能去说服那些整日处于悲惨经济环境中的穷苦人。更为糟糕的是，在阐述市场的威力时，它似乎想表明社会主义也行得通，即市场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市场，而在经济上丝毫没有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那些弊端。

目前看来，这种结论的错误性是显而易见的。但它错误的原因是值得人们深刻探究的。这一点对于我们在研究资本主义所使用的模型和研究现实经济问题时都具有重要意义。设立论坛讲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向人们揭示其含义。

我发现标准新古典模型中有关信息的假设是一个严重的失误，这一点对于跟随我工作的人来讲是不足为奇的。在我早期信息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我曾经指出标准信息假设方面的轻微变动，将彻底改变标准新古典理论的所有重要结论：因此这个理论最终是站不住脚的。

我希望论坛讲座不是去对标准模型吹毛求疵，而应该提出新的信息理论范式，深入探讨经济到底如何运行这个理论问题，例如，竞争和分权化的作用——为转型经济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提出政策上的解决方案。应该强调的是，支持标准理论的信息假设，也许正是该理论致命的缺陷。该理论的失败还不仅仅局限于我所强调的有关市场完备性、市场竞争性和创新匮乏这三方面的假设。

一个新的范式的建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的标准理论经过多年的不断完善，现在已经可以为数学的一般化来表述了。然而，即使再一般化的理论也无法解脱其相对性。那么，这种基本理论是否对研究经济有所裨益呢？这个问题并不完全依赖于相关函数的可微性。大量的智力资源被用来完善一个几乎不能解释经济的模型，这一事实表明思想市场

是非效率的，至少与资本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一样是非效率的。

本书运用了一些规范的数学模型来分析文中的某些观点。例如，给定信息条件下竞争的作用，在成员具有有限信息的组织中分权化的作用，在不完备市场和不完全信息经济中政府干预的作用——这些数学模型在书中均有所发展。但我的意图并不是去评述和拓展这些模型，因为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查阅有关的参考文献。相反，像维克塞尔论坛这样的系列讲座应注重把一套思想推广开来。如果在本书中我能对传统的占优势的模式提出质疑，如果我能说服读者去探索其他可供选择的模式，如果我们同行的智力资源因此而得到重新配置，那么，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达到了。对于从事转型过程研究的人们来说，尽管本书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但至少提供了一个可供讨论的框架，如果他们认为有所帮助的话，我将感到十分欣慰。

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学生、同事，特别是那些合著者，他们在过去20年里和我讨论这本书的构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尤其值得提出的是理查德·阿诺特（Richard Arnott），艾威·布瑞夫曼（Avi Braverman），帕萨·达斯古塔（Partha Dasgupta），布鲁斯·格林沃德（Bruce Greenwald），迈克尔·罗斯切尔德（Michael Rothschild），巴里·内尔巴夫（Barry Nalebuff），史蒂夫·塞勒普（Steve Salop），戴维·塞宾顿（David Sappington），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以及安德鲁·维斯（Andrew Weiss）。此外作为研究助手的乔舒亚·甘（Joshua Gans）和迈克尔·斯马特（Michael Smart），他们颇有见地的意见使最终的手稿增色不少。吉恩·科思特普（Jean Koentop）与琳达·汉德尔曼（Linda Handelman）出色的秘书工作使手稿的编辑打印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通过与在斯德哥尔摩参加论坛的同行们的切磋，以及通过与在布达佩斯、布拉格和罗马参加研讨会的同行们的交流，我受益匪浅，他们对我的启发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以不同的形式得到体现。我对社会主义所面临问题的兴趣，要追溯到读研究生的时期，当我在华沙的中央统计学院考察时，我与兰格（Lange），卡莱斯基（Kalecki）及其弟子